

“以意逆志”析

鹤岗矿务局 李贵良

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公元前389——前305年）为了利用文艺的宣传作用制造反革命舆论，使劳动人民成为循规蹈矩、俯首听命的奴隶，从而达到复辟奴隶制度的罪恶目的，不但全盘继承了孔老二的反动文艺观，而且还独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唯心主义的评诗方法，即“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所谓“以意逆志”，就是“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朱自清《诗言志辨》）。这里所说的“意”是指“说诗者”的思想，“志”是指作品所表现的思想。两者则要求互相迎合求得一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孟轲所宣扬的“意”和“志”究竟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他的文艺批评标准。孟轲曾多次强调文艺作品必须把反映奴隶主贵族的思想核心“仁”放在首位，这是他给文艺所规定的一条政治标准。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离娄》）意思是说音乐要以宣扬“仁义”为乐事。在诗歌创作上，孟轲也强调以“仁”为立足点，否则便骂为“小人之诗”。齐国的高子说《小雅·小弁》是“小人之诗”，孟轲说什么这是固执、机械地看问题。《小弁》为什么不是“小人之诗”呢？因为它表现了“仁”这一思想内容（“《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告子》）。既然孟轲所要求的“志”是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那么“说诗者”的“意”自然也是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

由此看来，孟轲所鼓吹的“以意逆志”就是要求“说诗者”复辟奴隶制度的反动思想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诗篇表现的思想相一致；对于那些被压迫阶级反抗奴隶主贵族或正确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篇，则要求“说诗者”不要受“文辞”的限制，可以抛开作品所反映的客观思想内容主观臆断地去解释，使之符合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思想要求。

《诗经》三百零五篇，有歌颂奴隶主贵族阶级的诗篇，也有一部分是揭露奴隶制度的作品。要想使“诗三百”为反动没落的阶级服务，除孔老二的删改、曲解外，“以意逆志”则又是反动阶级评论作品的“诀窍”。运用这种方法，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雅·文王》）之类的反动诗句，孟轲大加宣扬并要求读者“迎受”它的思想；对于象《小雅·北山》一类反抗奴隶制度的诗篇，他则给予歪曲。《北山》的作者是奴隶社会里的一个下层官吏，他通过这篇诗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奴隶主贵族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表现了作者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可是，孟轲对其中心思想却曲解为

“劳于王事不得养父母也”（《万章》）。在他看来，为国君效劳这是“忠”，因不能养父母而怨恨这是“孝”。两者虽然是矛盾的，但都合乎奴隶主阶级的要求。另外，诗作者对“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贤，即劳）这种奴隶主阶级内部大鱼吃小鱼的不平等现象的怨恨，孟轲只好闭着眼睛解释为“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万章》）。作贼心虚，孟轲觉得这样偷换主题实在不能遮人耳目，就用“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来加以掩护。其实，这正是“妄图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术语来掩饰唯我论真面目的唯心主义”（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后来的孔孟之徒朱熹大概看到他的老祖宗赖掉“大夫不均”也太露骨，就在《诗经集传》中解释说：“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独劳而曰独贤，诗人之忠厚如此。”其实，这种硬给诗作者戴上一项“忠厚”的帽子的拙劣手法根本救不了他祖宗的骂，反而暴露了朱熹不敢面对现实的胆怯心理。

孟轲处在新文艺茁壮成长、旧文艺日渐衰败的时代，当他看不见、听不到“仁言”和“仁声”时，就气急败坏，悲痛万分。他把新文艺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压制其成长，并且深恶痛绝地嚎叫什么要“正人心，息邪说，距诂行，放淫辞”（《滕文公》），“恶郑声，恐其乱乐也”（《离娄》）；同时，为了挽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同上）的残局，还学着孔老二的腔调竭力鼓吹复古倒退的文艺理论，祭起“以意逆志”这块“法宝”，要后人“迎受”古人的思想，要人们与古人为友（“尚友”《万章》），以此与新文艺相对抗，与进步的阶级相对抗。其险恶用心，就是要通过文艺的宣传作用拉历史的车轮倒转，使正在崩溃的奴隶主阶级免于死亡。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的检查的。”长期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受到反动阶级拥护的孔孟学说，就是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作为它的思想基础的。孟轲的“以意逆志”的评诗方法，是一切反动派认为最省力的歪曲古代作家作品为他们的反动政治服务的评诗方法。他们像得了什么“法宝”似的吹捧“以意逆志”“是孟子的特见”，是“后代诗话的萌芽”。文学史上的许多诗人都被反动派祭起孟轲这个“以意逆志”的“法宝”弄得面目全非。歌咏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的陶渊明，被涂抹成“浑身都是静穆”；主张过“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北征》）的杜甫，被扮成“和平诗人”。甚至于一些著名的法家诗人，也遭到恶意的歪曲：屈原被乔装成激发“天性民彝之善”、“增夫三纲五典之重”的忠臣；李商隐被描绘成在牛、李党争中钻夹缝、向上爬的官迷。一部中国文学史过去确是被孔孟之徒所惯用的“以意逆志”、瞎说一气的最省力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法把许多问题颠倒了。这种颠倒黑白的现象，真象鲁迅讲的：“实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题未定草》六）。不彻底批判“以意逆志”的反动儒家文艺观点，就不可能看到古代诗人及其作品的真象。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理清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把被反动派和孔孟之徒所颠倒了的历史颠过来。